

从秦简《日书》看战国时期的相宅术

杜林渊 延安大学人文学院 讲师

求吉避凶，人之所愿，故择吉术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盛行，广泛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甚至有时影响当时的政治生活。因此关于古代择吉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作为择吉术中内容非常重要的风水术（即后世所说的堪舆术或阴阳术）的研究，往往认为是其理论起源于两汉时期，形成于魏晋时期，而成熟于隋唐时期，大盛于两宋时期^[1]；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2]。这些研究对于探讨“风水”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的源流无疑有很大的意义。但秦简《日书》中关于“修宅择吉”内容竹简的出土及部分资料的发表，使得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根据秦简《日书》中“相宅”内容的记载，中国古代的“相宅术”的基本理论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初步形成。它是在先秦简单朴素的“适应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的基础上结合了阴阳五行观念而逐步形成的。本文试以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M11出土的秦简《日书》和1984年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日书》中的“修造择吉”的内容，试分析战国时期的“相宅术”^[3]。

相宅或称卜宅、相土、图宅、

卜食、卜宇、卜居、阴阳等等。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相阳宅和相阴宅，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言的相活人住宅和给死人相墓地。具体内容则包含很多方面，如关于“建筑”方位与姓氏的关系、葬日的选择与刚柔日的关系、建宅修屋与四天神和阴阳五行等的关系等等。秦简《日书》中有关修屋建宅方面的内容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从其中看到至少是战国晚期时期的人们有关与此的一些“习俗”。如：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本中有关室忌、土忌方面的内容：

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 九六正壹。……冬三月，毋起北乡（向）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九九正贰。

凡为室日，不可以筑室。筑大内，大人死……，筑外垣，孙子死。筑北垣，牛羊死。□杀日，毋以杀六畜，不可以 一〇〇正壹。取（娶）妇、家（嫁）女、祷祠、出货。□四废日，不可以为室，覆屋 一〇一正壹。

这些简文指出人们在一年之中不同时期修建不同朝向的房屋时，不能冲犯“帝日”，同时也指出动土兴功、建造房屋的凶日和忌日。

秦简《日书》甲种本有关“直（置）室”内容的共有二十七条。这一部分内容“图文并茂”，详细

解释了《门》图四个方向各个位置门的吉凶，具体内容涉及二十二个不同方向的“门”，如：

仓门，富，并居西南，圉居北乡（向），毋绝县（悬）肉 一一五正贰。

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 一一六正贰。

北门，利为邦国，贱人弗敢居 一二六正贰。

徙门，数富数虚。必并若人家。五岁更 一一六正叁。

东门，是胃（谓）邦君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 一一九正叁。

由简文可知，造房子门朝南开最为吉利，《门》图的南部六个门均是大吉大利之门，北方六个门均不吉利，东方和西方共十个门中除“失行门，大凶”外，其他门都较吉利。这与中国古代的建筑方位思想完全一致。

秦简“日书”中的“土忌”章主要记录了动土兴工、盖房筑墙等所应注意选择的良日和忌日。内容主要有：

土忌日，戊、己及癸酉、癸未、庚申、丁未，凡有土事弗果居 一三〇背。

春之乙亥，秋之辛亥，冬之癸亥，是胃（谓）□日，百事不吉。以起土攻（功）有女丧 一三六背。

正月申，四月寅，六月巳，十月

亥、是胃（谓）地，神以毁宫，毋起土攻（功），凶。

月中旬，毋起北南陈垣及 一三八背。

四月丙午，是胃（谓）召（招）（摇）合日，不可垣，凶。四月酉，以坏垣，凶。入月十七日，以毁垣，其家日减 一三九背。

由此可知，当时建房的时间禁忌甚多，土忌的名目有土神、地冲日、招摇合日等。

另外，秦简《日书》“梦”一章中也附有一部分关于“相宅”的简文，具体内容如下：

凡字最邦之高，贵贫 一五背壹。宇最邦之下，富而 一六背壹。宇四旁高，中央下，富 一七背壹。宇四旁下，中央高，贫 一八背壹。宇北方高，南方下，毋（无）宠 一九背壹。宇南方高，北方下，利贾市 二〇背壹。宇东方高，西方下，女子为正 二一背壹……宇左长，女子为正 一五背贰。宇多于西南之西，富 一六背贰。宇多于西北之北，绝后 一七背贰。宇多于东北之北，安 一八背贰。宇多东北，出逐 一九背贰。宇多于东南，富，女子为正 二〇背贰。道周环宇，不吉 二一背贰。祠木临宇，不吉 二二背贰。垣东方高西方之垣，君子不得志 二三背贰。

这是一段典型的“相宅”内容。其内容涉及到房屋的地形选择、圈、囿、井、庑等的方向选择，此外还有具体到房屋内的居室的分配以及屏风的安放位置和门的设置方位等事宜。如果说其它的关于“筑室建宅的禁忌”还不能说明秦简《日书》中的“相宅术”的理论的基本成熟，那么，这段“相宅”内容的记载无疑更具有代表性。

此外，云梦秦简《日书》甲种

本中还有一些有关于建宅筑屋等方面禁忌的记载，如“门”章；云梦秦简《日书》乙种，放马滩秦简《日书》的甲种、乙种中也有些有关于此的记载。

以上简要列举了秦简《日书》中关于修宅筑室等方面的一些简文，由简文可知，至少在战国晚期，“相宅术”理论已经很成熟了。这种在筑室建宅时的各种禁忌应该不是一时形成的，必然有其渊源，同时这种理论和禁忌对后世的“相宅术”的发展起了直接的影响。

相宅术在中国古代起源很早，但是具体的时间，则说法不一。笔者同意张荣明先生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所引用尹弘基先生的“寻找吉祥窑洞地点的一般准则”的观点^[4]。即“中国古代风水术是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考察的基础上，以长期积累的环境观察经验和阴阳学说为指导理论的一种术数”。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黄土高原的绵延起伏的山丘和黄河曲折流动所形成的背山临水，前面又有开阔地带（一般朝南）的地理环境有关，而这些地带也最适合北方居住者，它既可以挡住冬天的西北风，又能保证享受最多的日照。事实上，现在的北方地区的窑洞大都背依山而建。在现存的殷商卜辞中就有卜宅的内容，如武丁相土作大邑的卜辞：“贞：乍（作）大邑于唐土”（《金》611）；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583）；“乙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

（兹）唐。（《乙》570）等等。

从现在安阳商代宫室遗址的位置及地理环境来看，显然这段记载是与对商代晚期都城宫室座址有意选择的一种注解。周初，人们建造城市也要先勘查地形，进行占卜。《诗经》里有：“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的记载（《大雅·绵》），《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又载：“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说明了周武王在选择镐作为都城时使用了龟卜。《尚书·召诰》又载：“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劓既得卜，则经营。”

《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这段话说明了周公营建洛邑前的占卜的情况，而且是反复占卜。这也说明了最初的相宅是与占卜结合在一起的。但事实上，卜宅就是择地而居，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解释到：“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到后来，“相宅”的事，便由专门的人来做了。《周礼》载有：“土方士，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辩土宜之化之法，而受任地者。”土方士的职责就是用土圭测日影，度量土地，测定方位，选择适宜居住的地形，建立国家都城。

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中枢，因此如何选择都城的地形是古代风水术尤为关注的核心所在。

《管子·度地》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也”。“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此外，在先秦的其他的著作中也有关于相宅或者是人与地理形势的关系的记载。如《周礼·地官司徒》云：“以土宜之法，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等等。

由此可见相宅之术的起源还是比较早的，而且在至少在春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当然，由于各国地理环境、社会风俗等的差异，很有可能已经存在几个不同的“相宅术派别”。这可以从秦简和楚简的《日书》等方面的内容的比较而知。而我们如果将管子的那段精彩的论述与秦简《日书》中的“梦”章中的“相宅”内容作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显然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虽然并不一定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在“相宅”的思想理论上，二者的这种关系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秦简《日书》的“相宅”在内容上更为丰富，所适宜的范围更广而已。

两汉时期的“相宅术”内容的记载应该很多，但大多失佚，我们目前只能从其他一些书目辑佚的内容去考察。《汉书·艺文志》中即

录有的《宫宅地形》20卷和《堪舆金匮》14卷。在《宫宅地形》下班固的按语为“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这里的“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其实就是“相宅”。此外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中也有许多关于“相宅术”的记载。如在《论衡·诂术》中有“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遭祸。’‘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图宅的缘起，应与“图讖”和“图纬”有关。过去认为主要流行东汉，事实上早在西汉就流行，如贾宜在《鹏鸟赋》云：“发书占之，讖言其度”，陆贾在《新语·道基》中抨击世风时所云：“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异之变……”正因为在西汉时就已经泛滥，才有到东汉才出现“发天地，象四时”，“起五德始终，推其极而无不至”，“然后言天地至利害、事至成败”的“图宅术”的大盛的局面。此外在《淮南子·务修训》和《吴越春秋》中也有“相土”等的记载，“相土”实际上就是“相宅”^[6]。而与图宅术有直接联系的是“五音兴利说”。关于此，饶宗颐先生曾经利用秦简《日书》

中的相关材料有过很好的讨论^[6]。由此可以推知，班固所记载的《宫宅地形》应当是与秦简《日书》中的“相宅术”方面的内容相关，王充在《论衡》中也曾提及在汉代民间非常流行的《周公卜宅经》和《图宅术》等专门的卜书和卜术，应当也是与此相关的“相宅”专著。因此，“相宅术”在西汉不仅有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的成果，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应用。已有学者在研究西汉都城长安的平面布局中利用了相宅的理论进行分析^[7]，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以上考察了秦简《日书》中的“相宅术”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相宅术”的传承关系。下面就《日书》中关于“修屋筑室方面的禁忌”与后世的有关“建造的择日吉凶”和“阳宅择基概要”方面的内容试作一比较。

关于建造的择日吉凶，根据《宅经》载：“凡欲修造动治，须避四天神，亦名帝车、帝辂、帝舍。假如春三月东方为青帝，木王，寅为车，卯为辂，辰为舍即是。正月、二月、三月不得东户。经曰：犯帝车杀父，犯帝辂杀母，犯帝舍杀子孙。”《宅经》又说：“每年有十二个月，每月都有生气死气之位，但修月生气之位者福来集。月生气与天道月德合其吉路，犯死气之位为有凶灾也。”（按，十二个月中的生气、死气之位，是《宅经》对“四王神”避忌外而择日德一个补充，如正月生气在子癸（北）死气在午丁（南），六月生气在巳丙（南），死气在亥壬

(北),十一月生气在戌乾(西北),死气在辰巽(东南),以生气方位动土为吉,以死气方位动土为凶)。此外《宅经》还述及“土气”所冲之方:“凡修筑建造,土气所冲之方,人家即有灾殃,宜禳之。”就是说一年十二个月中每个月都有冲“土气”的方位,如五月土气冲乾方(西北),十一月土气冲巽方(东南)。而根据《阳宅十书》载,在修建起屋时还要对造基地、起工破土、定桑扇架、竖柱、盖屋、泥屋、起垣等都有所规定的吉凶日期。还有一种是十二天神(十二值即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依次轮流值日时所出现的吉凶宜忌,如“建日吉利,除日去旧迎新,吉利,满日祭祀吉,其他不吉,执日宜新建、忌移居、旅行,破日危日万事不利……”。通过比较可知,其中许多内容与秦简《日书》中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或相似的,虽然具体的操作方法可能不一样,但是其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八卦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根据高国藩先生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书中所引用的“敦煌写卷伯三八六五号《宅经》”,所开列的中古时代流传的《黄帝二宅经》(按在南北朝的梁时就有伪托黄帝之名作《宅经》,后世的《黄帝二宅经》即《黄帝宅经》可能是由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完成)中的“序”、“总论”、和“凡修宅次第法”所载内容中如对“二十四路阳宅图”的概念和宅法的基本原理的阐述中,指

出了宅有“五实”、“五虚”的观点。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宅门大内小、墙院(垣)不完、井灶不处,宅地度屋少庭院广。”实际上是指出了在设计修建房屋时所必须涉及到的问题。这与秦简《日书》中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而在“凡修宅次第法”中,其内容居然很相似。如《修宅次第法》中有:“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南入门为阳宅。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有林茂盛,居其内,吉……凡宅北高南下,名曰韩地,居之长富。”大约成书于明代的《阳宅十书》是一部专门探讨阳宅风水的专著,对于宅地的选择,曾有这样地记载:“凡地东高西低,生气降基;东低西高,不富且豪。前高后低,必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高前低,主多牛马。凡住地,平坦曰梁土,后高前低曰晋土,居之并吉。”这与秦简《日书》中“梦”章中的“相宅”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相宅术”作为战国时期择吉术中的重要内容,其一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历代相沿袭而成的风俗、习尚,流传极为久远,另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应当是一种术数,并且有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方法和语法系统。从秦简《日书》的“相宅术”的内容看,体现出了一种功利性和敬天顺时的特点。秦简《日书》的“相宅术”中基本包含了后世“相宅”的所有内容,如破坏垣屋、修造动土、立门户、盖屋、建仓库、做厕所、迁徙、入宅等,而且还运用了干支、

阴阳五行、月相、土神日、地冲日、招摇合日、地咎日等众多手段,为后世的“相宅”术奠定了基础。

注释:

- [1] 高友谦:《中国风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第49页。
- [2] 慧度、妙摩:《中国风水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4页。
- [3] 本文所引的秦简《日书》方面有关于“建宅和丧葬”方面的简文均出自于吴小强先生所著的《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
- [4] 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 [5] 史箴:《风水典故考略》,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 [6] 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261-280页。饶先生指出:《日书》中的五行与五音对《淮南子》有很大地影响,并说“此一材料可以揭开秦以前纳音的真面目。也许当时还有许多纳音地理理论和方法,这不过是其中一种。”
- [7] 吴宏岐:《汉长安城兴起与衰落原因的风水学解释》,《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